

# 五四時期李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 Li Da's Thoughts of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施純純\*\*

Chun-Chun Shih

Postdoctoral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 本文在審查期間，承蒙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惠助本文的修改，在此致上個人誠摯的謝意。至於本文中所有不足之處，全責在我。

\*\* 個人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02-27821693-199；d96123003@ntu.edu.tw

# 五四時期李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施純純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中文摘要

本文以一個在五四時期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李達（1890-1966）——的歷程，觀察他在五四運動時，如何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並解答現代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另一方面，本文將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社會革命的看法，與當時另一位重要的知識分子——陳獨秀——作一對照，指出兩人對於階級自覺與國家角色的不同看法，呈現兩人在各自的政治立場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差異，以呈現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多樣性與複雜面貌。

**關鍵詞：**李達、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資本主義、國家

## 壹、前言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提供了知識分子新思潮的選項，更進一步產生一股以馬克思主義為名、影響整個中國命運的政治力量。<sup>1</sup>然而，這一新思潮並非直接地給予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活動的指導。馬克思主義本身理論的複雜性、在中國的傳播的混亂情況、以及各種政治權力（第三國際、中共、以及雙方內部不同派系的鬥爭與解釋）均干擾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最後，歐洲馬克思主義預設革命將在資本主義中心爆發，與中國身為農業國家之實際情況，無論理論本身或實踐上的距離，亦造成中國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革命的困難。

上述種種困擾的因素以及理論和客觀條件的矛盾，雖然使馬克思主義無法直接作為中國革命的思想指導，但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利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工具以改變中國，卻也因此成為複雜而重要的問題。基於此，本文以中共創黨成員之一——李達（1890-1966）<sup>2</sup>——的範例，觀察他在五四時期社會主義論戰的背景下，在 1922 年 7 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

<sup>1</sup> 本文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一詞，引用 Maurice Meisner（1982）的定義：「西歐工業資本主義引發了創傷性的社會和政治變化，馬克思主義是對於這些變化的一種社會主義回應」。作為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回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本身亦有其複雜性。Meisner（1967）指出，Karl Marx 依據歷史的客觀力量來解釋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但他也強調人的意識、行動等主觀因素成就社會主義的關鍵作用；Marx 本人並未完全調和上述決定論（deterministic）和行動論（activistic）要素之間的衝突，而 Marx 之後，具有不同智識傾向、處於相異之歷史環境的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s），則依據不同的目的而重新運用、解釋 Marx 思想中的決定論和行動論要素。本文所呈現的五四時期李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亦是李達在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與行動論的辯證、矛盾中，試圖尋求一適合中國歷史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解釋。

<sup>2</sup> 李達，譜名永錫，字廷芳，號鶴鳴。1890 年 10 月 2 日誕生於湖南零陵縣的一個佃農家庭。為中共創黨發起人之一。1923 年夏，因國共合作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陳獨秀發生爭吵，隨後即脫離中國共產黨。1930 年以後開始專門講授辯證法，以及出版關於辯證法的專著。1949 年 12 月由劉少奇作介紹人，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孚做歷史證明人，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 1951 年之後陸續發表〈實踐論解說〉等作品解釋毛澤東思想，為毛澤東所讚譽。然而，1958 年起，李達對於「大躍進」和「共產風」提出批判，並與毛澤東當面爭論。之後，李達雖然在 1965 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卻未能阻止他於文革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命運，並於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病痛和批鬥的壓力下離開人世（王炯華等，2004；宋鏡明，1997、1986；丁曉強和李立志，1999；宋鏡明和熊崇善，1980）。

會之前，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將之應用於中國革命，呈現在共產國際強力主導中國革命之前，李達對於「經濟落後國家如何運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思考。

李達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性之一，是其 1930 年代的《社會學大綱》，被許多研究者視為毛澤東（1893-1976）的思想來源之一（王炯華，1988；丁曉強和李立志，1999；蘇志宏，2004；Nick Knight, 1996）。然而，儘管李達、毛澤東的思想有共同之處，李達也在 1949 年之後寫作解釋毛澤東思想，但中共建國之後，在龐大的黨機器和國家權力之下，李達仍於 1958 年與毛澤東當面爭論「大躍進」的策略與哲學問題（胡為雄，2015；王炯華等，2004）。顯見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和運用，無論在實際歷史過程或學術思想上，均有一定的獨立性與重要性。

關於李達早期思想的研究，研究者多側重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與支持、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行動，以及他與陳獨秀（1879-1942）等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回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共同立場，而較少著墨李達五四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否、如何不同於與有著共同政治立場的其他中共早期創建者（王炯華，1988；丁曉強和李立志，1999；易國喜，1997；閻穎，2001）。因而，透過分析、比較李達和陳獨秀這兩位同樣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僅從兩人差異中推論兩人可能的策略分歧和往後不同的政治選擇，呈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複雜面貌，亦從李陳二人思想比較中呈現李達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特殊之處——即強調中國已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之下，因而能夠透過人為激發階級覺悟而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革命之後，中國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發展工業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充分，再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解釋中國在工業發展不足的情況下欲進行社會革命、實踐社會主義革命的矛盾與困難情況。<sup>3</sup>

<sup>3</sup> 在西方學界少見的對於李達的專門研究者——Nick Knight——討論李達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時，聚焦在李達思想中經濟基礎和人類主動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強調李達重視階級自覺以發動社會革命的面向，並未討論在中共二大之前，李達先進社會革命、後於過渡階段發展生產力的思想特色，也未處理五四時期李達與其他中國早期重要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異同（Knight, 1996）。而李達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類主

之所以選擇陳獨秀作為李達思想的比較對照，原因在於兩人在中共建黨初期的密切交往，但又在 1923 年分道揚鑣的歷程。1920 年初，陳獨秀到上海不久，《新青年》編輯部亦遷至上海，8 月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陳獨秀擔任書記；此時，李達離開日本回到上海，拜訪陳獨秀討論社會革命與組織共產黨的問題，並寄住在陳獨秀漁陽里 2 號的寓所中，為上海發起組成立成員之一；之後，李達擔任 1920 年 11 月創刊的中共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的主編，於 1921 年 2 月代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書記，以及幫助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22 年中共二大更於上海李達的寓所召開（唐寶林，2011；王炯華等，2004）。然而，李達於中共二大之後脫離政治活動，轉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應毛澤東之邀擔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於 1923 年夏在上海與陳獨秀因國共合作的方式發生爭執，憤而脫黨（王炯華等，2004）。由此可知，在中共建黨初期，李達與陳獨秀實有著密切來往與共同政治立場，但也有著激烈衝突。因而，比較李陳二人在五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呈現兩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共同點以及分歧之處，亦能幫助理解二人思想或政治行動的抉擇。

以下即就 1980 年、1988 年出版的《李達文集》之第一卷、第四卷所收錄李達 1919-1922 年中的文章和回憶，說明李達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對於馬克思主義重要議題的探討（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政治強制力的角色、以及人類行為的主動性等），以解釋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特色。並且就 1993 年出版之《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所收錄的五四時期陳獨秀的文章，比較李達思想與陳獨秀的差異。最後，從二人之思想異同所推導出的不同革命策略，以及兩人策略與實際政治局勢互動的情況，進一步呈現中國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的複雜與多樣性。

---

動性、生產力發展和國家角色等問題、如何將這些問題融合成爲他對於中國革命的整體看法、並有別於具有同樣政治立場的陳獨秀，則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 貳、李達到馬克思主義之路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時，李達正在日本留學。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李達救國的新途徑，並吸引原本醉心於以實業、科學救國的李達的興趣。根據李達 1957 年的回憶，他描述了當時對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想法：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動了全世界，也震動了中國人，而最有敏感的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我在日本東京，從日本報紙上知道了俄國大革命的消息，據說是列寧領導的「過激派」實行「過激主義」，領導俄國工農兵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農政府，也叫做列寧政府。……我當時對於這樣一個國家感到無限的喜悅，就留心看報紙上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謂「過激派」和「過激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和布爾什維主義，而布爾什維主義就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又是馬克思主義，這才知道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名稱。……我當時還抱著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正在學習物理數學，對於社會主義的著作很少研究（李達，1988）。在日本的李達，也注意到「當時日本社會主義信徒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學說，但都不是系統的介紹」（李達，1988）。十月革命雖然引發了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注意，但無論是十月革命或在日本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並未能夠動搖李達「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道路。促使李達放棄「實業救國」而轉變為以馬克思主義「革命救國」的原因，是一次未能成功的抗議活動。

1918 年春天，日本政府和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禦軍事協定》，公然允許日本軍隊進入東北，引發留學日本之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熱潮。許多留學生決定組成留日學生救國團並回國抗議，李達就是其中之一。李達當時被分派到北京，一面呼籲北京學生起來救國，一面向段祺瑞政府請願（李達，1988）。然而，這些留日學生受到段祺瑞政府軍警的監視，也未能引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運動的失敗使李達深切的感到，「為要救國圖存，首先就要由人民起來推翻反動的軍閥政府。就我個人來說，我再回到東京以後，決心放棄實業救國的思想，採取革命救國思想，停止物理數學的學習，專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李達，1988）。顯然，李達之「革命救國」聯繫了馬克思、列寧和俄國道路。如此，為了以馬克思主義來「革命救國」，李達初步學習了馬克

思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說，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李達，1988）。但儘管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李達卻認為當時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很少，也無法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情況，「只知道中國有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向俄國那樣幹無產階級革命，如此而已」（李達，1988）。對於當時的李達而言，基於中國參考、仿效俄國革命經驗的迫切需要，無論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解釋，或關於馬克思主義如何應用於中國等問題，俄國的經驗和其政策的變化均是重要的參照。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當時尚在日本的李達撰寫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陸續從日本寄回，分別於1919年6月18日、19日發表於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並以〈陳獨秀與新思想〉（1919年6月24日）一文，聲援因散發傳單被北京政府逮捕的陳獨秀（王炯華等，2004）。〈社會主義的目的〉、〈什麼叫社會主義〉二文，是李達最早闡述社會主義的文章，也是李達於日本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初步成果。在〈什麼叫社會主義〉一文中，李達（1980）感嘆近時許多人將社會主義當成無政府主義、將無政府主義置於社會主義之上的情況。顯示在當時「社會主義」一詞廣為流行，但名詞又常被誤解、混用的情況下，李達透過其文章，試圖澄清「社會主義」一詞指涉的具體意涵和目標。此外，文章中指出，「社會主義」主要針對十九世紀的「文明弊病」，是法國政治革命成功推倒皇帝、貴族和寺院僧侶的特權之後，在經濟社會仍存在的「貧者越貧（這是勞動者），富者越富（這是資本家）」的貧富差距問題；因而，社會主義「一面是救經濟上的不公平，一面是恢復人類真正平等的狀態」（李達，1980。括號中的解釋為李達所加）。

在〈什麼叫社會主義〉（1919年6月）一文中，李達從經濟上區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不同之處，是前者廢除私有資本並主張共同生產及支配，後者廢除私有財產並主張共同的生活；此外，「無政府主義」全然不承認「國家的組織」，但「社會主義」需要「一種代表社會的中央機關」，用以「統一社會產業」（李達，1980）。由上述思潮的比較來看，李達獨鍾「社會主義」之「廢除私有資本並共同生產與支配」以及由一「代表社會的中央機關」統籌產業的特徵。在之



後的文章中，儘管李達所運用的辭彙不盡相同，但他所支持而為之辯護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共產主義」或「馬克思派」等名詞和派別，都指涉著一個擁有中央機構統籌管理生產和分配、廢除私有資本的平等社會。<sup>4</sup>由此可知，儘管李達從「實業救國」轉向「革命救國」，但他對於用以革命救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除了救濟經濟上之不平等之外，還關注馬克思主義如何進行經濟生產的問題。如此一來，透過馬克思主義，李達延續著原先希望發展中國實業、科學的理想，並將之與革命結合起來，企圖為中國尋求一條最好的經濟生產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李達於 1919 年提出了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和理想，但關於「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等問題，李達在此時並未多著墨；而他試圖提出解決實際中國社會問題的辦法，也非改造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例如 1919 年 10 月發表的〈女子解放論〉中，他認為女權衰落的原因在於生產方式的轉變，男子的勞動力能夠掌握生產事業（畜牧農工），產生父系的私有財產制度，確定了男性中心的社會以及女子的商品化（李達，1980）。「生產方式」、「財產關係」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連結出現在李達的分析中，被他視為女子地位低落的原因。但李達（1980）在該篇文章所提出的解放中國女子的方法，卻不是改變既有的、男性占優勢的生產關係，而是強調男女共同教育、改善婚姻制度、女子精神和經濟的獨立、普選權、廢止家庭惡習、以及禁絕娼妓等方法。在文章結尾，李達（1980）強調「如今要將女子解放，須先使他恢復物質上的自由」。然而，何謂「物質上的自由」？教育、改善婚姻制度等方式如何能夠「恢復物質上的自由」？卻是李達於 1919 年尚未回答的問題。

<sup>4</sup> 例如李達在 1920 年 12 月〈社會革命底商榷〉一文中，即指出「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主張複雜。我趁先提出兩個主潮，就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個主潮，就是在生產和分配的法則上分別的」（李達，1980）。



## 參、社會革命的前提

1920年8月19日，李達結束留學生活回國，於9月6日抵達上海（石川禎浩，2006）。李達回國之後，寄住於陳獨秀家中從事中共建黨的活動，不久便發生了社會主義論戰。關於張東蓀等人與李達、陳獨秀的論戰，以張東蓀於1920年11月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所開啓。而這篇文章源自1920年10月，張東蓀與楊端六等人陪同羅素到湖南演講，沿途所見的感受，認為中國的問題在於貧窮，中國應主要著重於「開發實業」以「增加富力」；張東蓀的文章發表之後，隨即引起李達等人的批評（蔡國裕，1988）。而無政府主義者與李達等人的論戰，則可追溯至1920年5、6月，曹乾元和邵力子等人在《民國日報》上關於「強權衛公理」的爭論，1920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一文，批評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開啓了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派之間的論戰（蔡國裕，1988）。藉由社會主義論戰，馬克思主義派產生了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的認同（identity），並清楚地區隔了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的界線（Dirlik, 1989）。本文接下來即針對李達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和解釋，以及與陳獨秀之間的比較，說明李達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特徵。<sup>5</sup>

關於社會主義論戰的第一個問題——「中國應該用何種方式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派（陳獨秀、李達等）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派（張東蓀、梁啟超等）基本共識在於中國的確需要工業化，但對於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方式產生爭執（蔡國裕，1988）。張東蓀與梁啟超等認為，中國太過貧窮，需要「開發

<sup>5</sup> 李其駒等（1991）將「社會主義論戰」定義為「同盟會以來革命派與改革派關於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論戰的深化和發展。其實質是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蔡國裕（1988）在其社會主義論戰的專門研究中，以「改革與革命」描述基爾特社會主義派與馬克思主義派的爭論，與李其駒等相似，但蔡國裕將「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也包含進「社會主義論戰」的範圍中，認為「這兩種爭論的內容雖有不同，但他們都是在社會主義的基本觀念下關於方法和步驟的爭論，因而通稱為社會主義論戰」。此外，溫樂群、黃東姪（2004）對於「社會主義論戰」的定義和範圍與蔡國裕相同，將無政府主義者也歸類在論戰的範圍。基於馬克思主義派的李達和陳獨秀都參與兩個問題的討論，討論內容也都與社會主義相關，因此本文的「社會主義論戰」採用蔡國裕和溫樂群等的定義，即馬克思主義派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的爭論。

實業」以增強富力，而非貿然進行社會革命；但陳獨秀與李達等認為，國際資本主義是中國之所以貧窮的主因，因此社會革命應先行，中國才有發展的可能，況且，社會主義是中國發展工業更好的制度。蔡國裕（1988）以「社會改良或社會革命」來形容兩派的爭執，突顯出他們規劃中國社會發展之緩進、急進的不同方法；王炯華等（2004）與宋鏡明（1997）等則認為，兩派主要爭執的焦點在於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本文主要側重兩派對於「實施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的不同理解，以及雙方對於「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聯性」的界定差異。

張東蓀在陪同羅素到湖南演講，目睹湖南農村貧窮的現況，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中指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至於各種主義的不同主張，張東蓀認為這都應等到中國人能過著「人的生活」之後再談。<sup>6</sup>張東蓀認為，中國的貧乏有遠因與近因的分別；遠因為企業不道德所導致的資本不集中和物產的未開發，近因為歐美資本主義壓迫，而「中國至今日所以愈加貧困者，尤在近因」。<sup>7</sup>

到此為止，張東蓀對於中國生產力不發達的診斷，至少在外國資本主義壓迫中國實業的部分是接近馬克思主義派的；然而，在這個共同點之外，張東蓀認為中國缺乏實踐社會革命、實行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而提出不同於馬克思派的發展生產力方法。張東蓀指出：

弟以為聯絡各國社會黨謀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固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補助於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則於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國資本勢力下乘其空隙以開發實業耳。特吾之開發實業非欲造成強厚之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以與外國對抗，吾人固知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絕對不能造成，不

<sup>6</sup> 張東蓀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發表之後，引發了許多批評，張東蓀也做出了回應。陳獨秀將這些文章匯集起來，以〈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之名刊登在 1920 年 12 月《新青年》第 8 卷第 4 期。上述張東蓀的觀點，引自〈東蓀先生「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收於《新青年》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參見新青年（1920 年 12 月）。

<sup>7</sup> 上述張東蓀的觀點，引自〈東蓀先生「答高踐四書」〉，收於《新青年》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參見新青年（1920 年 12 月）。

過吾人之意在培養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弟以為第一步當使社會上無此種求生不得之人，則始有抵抗能力。他日盡歸類於資本勞動之兩階級，而有階級戰爭，則進一步矣。……夫在未演成資本勞動之兩大階級社會，易言之，即在未發生階級戰爭之社會（或稍稍發生而不成形），社會主義之說決不能入人耳而動其心。<sup>8</sup>

由上述引文可知，張東蓀並未反對顛覆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但他既懷疑中國參與世界革命的能力，也強調社會主義必須適用於具有「資本勞動兩大階級」的社會。另一方面，張東蓀雖然對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樂觀，認為「今日歐洲資本主義已推車撞壁，固始成此末路之現象」，但他仍「確信中國將來必演成資本與勞動之兩大階級」，認為中國將來無可避免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sup>9</sup>

李達很快地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的《民國日報》副刊上發表〈張東蓀現原形〉，反駁張東蓀的看法。他指出，「開發實業」與「人的生活」之間並沒有必然性，因為在實業發達的歐美國家中，「大多數人民辛辛苦苦替別人作工，替別人賺錢圖安樂，自己也還難得溫飽」（李達，1980）。在〈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1921 年 5 月刊登於《新青年》）一文中，李達回應與張東蓀同樣立場的梁啟超，進一步說明中國無法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他認為，「中國是萬國的商場，是各資本國經濟競爭的焦點，是萬國大戰爭的戰場」，因而「當著產業萬分幼稚的時代又伏在各國政治的經濟的重重勢力之下的中國，想要發展資本主義和各資本國為經濟戰爭，恐怕要糟到極點了」；因此，梁啟超認為中國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的看法，李達認為那基本上應該是「空想」（李達，1980）。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發展，且基於資本主義本身生產方式的缺陷，李達（1980）認為，「將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必歸著於社會

<sup>8</sup> 括號中的解釋為張東蓀所加。上述張東蓀的觀點，引自〈東蓀先生「答高踐四書」〉，收於 1920 年 12 月《新青年》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參見新青年（1920 年 12 月）。

<sup>9</sup> 上述張東蓀的觀點，引自〈東蓀先生「答高踐四書」〉，收於《新青年》之〈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參見新青年（1920 年 12 月）。

主義」，而「歐美日本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顯然向著社會主義進行」，中國也必須於此時開始準備實行社會主義。<sup>10</sup>

除了說明中國應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李達接著在 1920 年 12 月發表的〈社會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解釋中國為何能夠進行社會革命。他首先引用「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來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已有田主、佃戶等「階級」；更重要的是，中國當前已經是「產業革命的時期」（李達，1980）。李達進一步描述了中國在產業革命時期，國際資本家與中國勞動者的對抗：

中國的資本階級，是國際的。資本家差不多都是歐洲人美洲人和日本人，也有最少數的中國人在內。……那些大工廠中造出的商品，輸入到中國來，中國的手工製造品，受了打擊，不能和他們競爭，於是手工業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廢了不做，到工廠中去做工，充機械的奴隸去了。還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個機械的奴隸猶不可得。……所以中國是勞動過剩，並不是沒有勞動階級。在這一方面說起來，是國際資本階級與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李達，1980）。

如此，中國過去和現在均充斥著階級的對立與矛盾。中國原本已有「田主佃戶兩階級的分立」，而現在又形成「資本勞動兩階級」，「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抗越發顯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增大，有產階級的財富增加，社會革命的機會到了」（李達，1980）。

1921 年 5 月，李達在〈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一文中，再次強調資本主義之國際性與中國大多數人為勞動階級的對比。他指出，「中國境內的資本家是國際的，全國四萬萬人——由某種意義說，都可算是勞動者——雖然有許多無業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業的勞動者」，因此，就中國而言，是

<sup>10</sup> 許多學者均側重此一論戰中，李達主張中國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明。相關研究參見王炯華等（2004）、宋鏡明（1986、1997）、丁曉強與李立志（1999）、羅海濤（2008）等。

「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李達，1980）。由此可知，即使中國工業極為貧弱，但李達判定中國是否能行社會革命的經濟基礎，並非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而是中國社會因工業資本主義影響而逐漸增加的階級矛盾和緊張（Knight, 1996）。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並不僅在中國社會內部而已。李達「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的說法，說明了中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的勞動階級位置，因而具有社會革命的資格；而革命進行的過程亦融合了民族與階級，將中國反抗國際資本家的階級鬥爭與民族解放都置於社會革命之中。

而陳獨秀對於張東蓀等人的回應，也與李達持相似的觀點，即對於資本主義的國際性和對於中國的影響持悲觀的看法，並指出中國勞動者與歐美資本家的對立。陳獨秀 1921 年 1 月 15 日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之後經陳獨秀修改，於 1921 年 7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社會主義批評〉一文，說明資本主義因生產過剩導致了經濟恐慌，而「殖民政策一時的救濟」，雖延緩了危機的爆發，但資本主義因而與軍國主義結合，為爭奪殖民地而釀成更大的危機（陳獨秀，1993）。陳獨秀在該篇文章中判斷，歐戰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底危機必然崩潰的運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中國雖然資本主義並不發達，但因資本主義的國際性以及即將崩潰的命運，中國絕不能發展資本主義，且「中國全民族對於歐美各國是站在勞動的地位，只有勞動階級勝利，才能救濟中國底危急及不獨立」（陳獨秀，1993）。

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與李達同樣指出中國應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亦同樣提出「中國勞動者」與「外國資本家」對立的論述。這一結合了階級分析與民族，將中國視為「無產階級民族」的觀點，早在 1920 年初即為李大釗所提出（Meisner, 1967）。雖然李達亦主張此一觀點，將中國整個民族都視為勞動者、無產階級，受到歐美各國資本家的壓迫，但李大釗與陳獨秀在這一觀點上的共同立場，則較被研究者注意（Dirlik, 1989）。該論述的策略意義在於，中國無須受限於中國內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而能直接作為全球反資本主義之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王遠義，2001）。基於此，中國即使工業落後，但仍具有進行社會革命的資格與前提條件。李達等人不僅在論戰中澄清思

想，並進一步以公開政治宣言的形式，主張中國可立即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1920 年 11 月標誌著「中共黨員宣告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的《共產黨》月刊創刊，《共產黨》創刊號的文章中明確使用了「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字句，是中共在刊物中第一次自稱「共產黨」，因而被學者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重要指標之一（石川禎浩，2006）。《共產黨》創刊號〈短言〉，提出資本主義在歐美傾於崩壞而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的趨勢、中國勞動者（無論在外國或在本土）是外國資本家直接或間接的奴隸、以及主張「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的主張（共產黨，1920）。

《共產黨》創刊號〈短言〉呈現李達、陳獨秀回應張東蓀等人的觀點，但〈短言〉的作者卻存在爭議。學者唐寶林根據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信，指出陳獨秀是該篇〈短言〉的作者（唐寶林，2011）；但研究李達的王炯華，卻認為李達才是〈短言〉的作者（王炯華等，2004）。且《李達文集》與《陳獨秀著作選》，都收錄了這一篇〈短言〉（李達，1980；陳獨秀，1993）。然而，無論陳李二人誰是真正的作者，這篇〈短言〉均反映了兩人當時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對中國革命的共同看法。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發表，其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和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聯合第三國際、承認黨的根本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以及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與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繫（中央檔案館編，1991）——亦延續著李達、陳獨秀的觀點，公開主張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進行推翻資本主義之社會革命。

然而，即使〈短言〉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宣稱中國擁有進行社會革命的前提條件，但落後的中國如何進行社會革命？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關鍵動力又是什麼？仍是馬克思派必須回答的問題。陳獨秀於 1920 年 9 月發表的〈談政治〉一文所挑起、李達亦參與其中的與無政府主義派的論爭，即是回答國家（政治強制力）在社會革命過程與社會主義階段中的必要角色。而李達解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一步說明人為力量的主動介入，能夠促進階級自覺和



階級鬥爭的發生，使社會革命加速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在 1921 年下半年之後，李達與陳獨秀分別在政治強制力的作用與唯物史觀的理解上有所轉變——李達強調政治強制力調控經濟的能力以及人類行為能動性的力量，而陳獨秀強調唯物史觀的科學必然性特徵和生產力的重要性。這些轉變不僅昭示著兩人思想上的分歧，更使兩人的思想與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二大）決議（1922 年 7 月）有著不同的距離。以下即就李達如何回應無政府主義以及對於唯物史觀的解釋，來說明階級鬥爭與國家力量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 肆、「國家」力量的作用

陳獨秀於 1920 年 9 月發表的〈談政治〉一文，被學者認為是開啓馬克思派與無政府主義者論戰的重要文章（蔡國裕，1988；Dirlik, 1991）。在該文中，陳獨秀指出政治「強權」之所以必要，首先在於原本被壓迫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征服資產階級，才能改變經濟不平等的狀況；第二，在征服了資產階級之後，也必須利用「強權」防止資產階級的陰謀活動，矯正、改變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惡習和思想；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分，絕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而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改變制度之後馬上可以消滅，因而，強制勞動、避免因男女關係夾雜著政治經濟的影響而危害社會安寧，都需要法律的制裁（陳獨秀，1993）。

上述陳獨秀對於為何需要「強權」的說明，至少就地一、二點而言，解釋社會革命需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尤其呈現了政治力之「國家工具階級化」的性質（楊貞德，2000）。相較於陳獨秀於〈談政治〉（1920 年 9 月）一文側重政治權力在改造社會過程中鎮壓資產階級、維護社會秩序的政治作用，李達在 1919 年 6 月所發表的〈什麼是社會主義〉一文中，關注的卻是政治強制力的經濟功能。在 1919 年的文章中，李達透過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比較，以「一種代表社會的中央機關」用以「統一產業」，作為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差異，關注不同制度下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也關注政治力量該如何有助於發展生產力的功能（李達，1980）。雖然陳李二人對於政

治力運用之問題，最初各自偏重鎮壓和經濟兩方面，但隨著論戰開始，李達的文章有更多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明，陳獨秀的文章也關注更多政治力統籌生產的功能。

李達在 1920 年 12 月完稿、1921 年 1 月發表的〈馬克思還原〉一文，描述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即是「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建立勞動者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掌握了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主要任務在於「施強迫手段奪取資本階級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勞動者的國家手裡，用最大的加速度，發展全生產力」，如此，雖然「國家是一階級壓迫他一階級的機關」，但改變其階級基礎之後，「勞動階級的利益，成為社會全體的利益」，「生產力完全發達，人人皆得自由發展」，「國家」自然消滅，自由社會也就實現了（李達，1980）。

在 1921 年 5 月發表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一文中，李達對於無政府主義提出一綜合性的批評。李達基本上肯定無政府主義抱持著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但強調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滅絕資本主義的手段，因而進一步強調政治強制力如何在生產分配以及對抗資本主義兩方面發揮作用：

一切無政府主義，對於人性的研究太樂觀了，對於政治太悲觀了。……例如就生產消費設想，假令放任就不能勻平，所以把生產和消費都歸中央管理，較為穩妥。就是有許多人要規避勞動，也有設法使各人為社會作工的必要。有許多人所嗜好的物品，也要使他們習慣了為社會割愛。至於強制，程度雖有不同，而在某時期，卻有行使的必要。監獄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為要對付反對共產主義的人。軍隊也要的，因為要對抗那資本主義的敵國（李達，1980）。

Arif Dirlik（1991）認為，對比無政府主義僅關注分配，李達強調共產主義在經濟上的優越性——提倡以中央機關主導的生產和分配，以及實現這一生產的手段——顯示李達清楚呈現了馬克思主義鑑別問題的方式。而在經濟層面的作用之外，上述引文亦顯示，李達同樣關注政治強制力的鎮壓功能，例如共產主義者需以政治強制力「對付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和「對抗那資本主義的敵

國」。

而陳獨秀 1921 年 1 月 15 日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之後於 1921 年 7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社會主義批評〉一文，相較於 1920 年 9 月的〈談政治〉，提及更多政治強制力的經濟作用。陳獨秀（1993）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比較，指出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導致了自身的危機，而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下，「一切生產品底產額及交換都由公的機關統計調節或直接經營，務使供求相應，不許私人投機營業」的優越特徵。對於無政府主義強調團體可自由聯合的觀點，陳獨秀亦從經濟的角度加以批評。他指出「各個生產團體各個利害不同，若是沒有一個統一機關用強制力去干涉調節，各個生產團體主張各個的絕對自由，這樣能聯合不能？」（陳獨秀，1993）。在陳獨秀發表〈社會主義批評〉演講之後，區聲白三度致函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陳獨秀並將他與區聲白的通信論戰發表於 1921 年 8 月的《新青年》。與區聲白的爭論中，陳獨秀深化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之自由聯合的批評，強調政治強制力維護社會中生產團體結合、以及維護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功能（陳獨秀，1993；新青年，1921）。

如此，在上述文章中，李達與陳獨秀共同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辯護，也同樣肯定一個以中央強制力統籌、協調生產、分配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然而，1921 年中之後，兩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上，卻更加偏重了各自原先的思想傾向。陳獨秀在 1922 年 4 月演講、7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馬克思學說〉一文，關於「勞工專政」的說明，強調鎮壓資產階級的政治功能。他指出，「現在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爭鬥，也必然要掌握政權利用政權來達到他們鬥爭之完全目的」，並引用馬克思之《哥達綱領批判》，指出「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陳獨秀，1993）。而李達方面，隨著俄國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解釋上，進一步加上了政治權力調節、發展生產力的任務，以銜接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sup>11</sup>

<sup>11</sup> 列寧自 1920 年底開始醞釀調整經濟政策，1920 年開始通過一連串關於向農民收受食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國家將無法經營的企業出租、允許蘇俄公民可以自由從事手工

在〈俄國的新經濟政策〉（1922 年 1-2 月）一文中，如同陳獨秀，李達亦引用《哥達綱領批判》說明「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必有一過渡的時期，這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李達，1980）。但李達對於這一「過渡時期」的解釋，則不同於上述陳獨秀側重的政治鎮壓功能。李達解釋道：

馬克思並未詳細敘述在這過渡時期的經濟怎樣，他是故意如此的。因為各國經濟進化的程度不一，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素的比比例亦因之不同。他所認為重要而堅持的，即是無產階級專政，至於經濟上的設施，完全應由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考察各國的情形而決定（李達，1980）。

如上述引文描述，同樣都引用《哥達綱領批判》，相較於陳獨秀側重的「政治的過渡時期」，李達更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之「過渡階段」作為落後國家調整、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功能。

而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能發揮如此的功能，李達認為主因是國家性質的轉變。基本上，俄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由布爾什維克執政而非中產階級執政，因此俄國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便是反抗家庭工業手工業、小資產階級的唯一武器，便是加速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因為實行社會主義的唯一條件就是要有大工業，國家資本主義便是準備這種大工業）的工具」（李達，1980。括號為李達所加）。因而，當政治權力的基礎改變，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所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雖與「資本主義」同樣具有發展工業生產力的作用，但兩者造成的社會結果卻相當不同。

此外，在〈俄國的新經濟政策〉（1922 年 1-2 月）一文中，李達對於社會主義階段的描繪，加上了「大工業」的物質條件（李達，1980）。這意味著工業生產力不足的國家，例如俄國，即使社會革命成功，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但因缺乏大工業生產力，仍無法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李達（1980）以

---

業和開辦小企業、以及允許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等措施，具有改善農民處境、增加糧食和其他工業原料產量、以及恢復蘇聯經濟等目的（周尚文等，1993）。

「各國經濟進化的程度不一」來描述各國的不同情況，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素的比率」作為衡量各國經濟情況的標準量尺，各國的差異因而得以用同一經濟量尺來表達。而這些國家在革命前，無論資本主義發展程度高低，都能夠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調整生產力，以銜接馬克思主義規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原理。<sup>12</sup>如此一來，政治力量不僅在推翻資產階級、維護革命成果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更因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中主導各國發展生產力，而具備調節各國特殊情況，以符合馬克思主義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規範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之理論的普遍性。

身為已經開始產業革命、但工業依然落後的國家，中國自然適用於馬克思主義這一普遍原理，尤其俄國新經濟政策已經示範了改變國家性質和在過渡時期發展生產力的可能性。然而，李達（1980）同時憂慮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風險，包括國家是否能供應足夠工業品、如何控制囤積藏匿、以及小資產階級使共產黨墮落等問題，並指出挽救這些風險的辦法之一，是各國無產階級應盡快進行革命，推翻國內資產階級，以援助俄國和自身。如此，李達對於俄國新經濟政策的詮釋，既預示了中國社會革命之後的道路，並指出中國肩負著維護俄國革命成果的責任。中國革命因而不僅是中國內部發展生產力的道路選擇問題，還是各國參與的、以俄國為首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sup>12</sup> 王炯華等（2004）學者認為，李達對於俄國新策的理論分析，對於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說明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說明這些私營企業、國家資本主義等政策，不僅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反而增強中國的活力和國力。羅海滢（2008）則認為李達所關注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所實行經濟政的，短暫的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但因時間很短，國家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因而在「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中，很長時間還需要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然而，無論李達的理論用以解釋中國改革開放或建國初期的經濟政策，均意味著若中國欲從資本主義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僅進行社會革命並不足夠，中國還需補足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工業生產力。這是五四時期李達主張中國可立即推翻資產階級時，針對生產力不足的現實所提出的補充手段，以彌合中國工業落後的現況與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革原理之間的差距。

## 伍、李達的唯物史觀——人類行為能動性的力量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李達的寓所召開（王炯華，2004）。中共二大正式提出〈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並在附件中同意遵守第三國際的綱領和決議（中央檔案館編，1991）。這一事實顯示中共接受第三國際以世界革命中心的角色來規劃和指導中國的革命前途，並接受第三國際所提供的馬列主義理論解釋。更重要的是，中共二大的主張受到 1920 年第三國際二全大會（以下簡稱第三國際二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決議的影響，因此反映了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進程、革命策略的規劃，也反映了規劃背後的列寧的世界革命觀及中國在俄國世界戰略中的位置。<sup>13</sup>根據列寧之〈關於民族與殖民地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關於民族與殖民地決議〉，其主要觀點是，由於落後國家的主要居民群眾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體現者，因而任何民族主義運動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共產黨人必須支持農民運動，而不能直接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與政策；在具體策略實踐上，共產國際應與殖民地與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但須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1997）。根據這一觀點，落後地區所進行的革命，第一階段僅能是聯合殖民地民主派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不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在中共二大召開之前，李達在上海持續研究馬克思主義、觀察俄國政局的變化以修正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上一節李達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的理

<sup>13</sup> 中共一大於 1921 年召開，而早在 1920 年第三國際召開的二全大會所討論的與中國相關的議題（例如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殖民地革命的首要任務等）卻未出現於中共一大中。關於這一點，石川禎浩（2006）指出，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到後匆忙決定召開的中共一大，會中的兩份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綱領〉與〈中國共產黨目前政策〉（即〈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是模仿歐美共產黨的文件，而其中的激進觀點（例如主張與其他反對共產黨的黨派斷絕一切關係），不僅與共產黨當時成立時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直線的思維模式——「社會主義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以建設公有制經濟」——有關，而且也因為租界當局搜查開會地點這一突發事件，使中共一大大會不得不臨時改變會址，並匆忙宣告閉幕，以至於會議文件並沒有反映出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決議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盟的方針，而是出現了濃厚的激進色彩。



解變化（強調政治力調節經濟的功能），即是李達因俄國新經濟政策而修正馬克思主義解釋的例證。然而，雖然中國已開始產業革命、中國人大多為勞動者的事實，使中國具備社會革命的條件，但中國如何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李達根據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人類行為能動性的力量可加速社會革命的進行——則始終強調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本節即是討論李達的唯物史觀，以及從其唯物史觀所推衍出的革命策略，如何與 1920 年《共產黨》月刊〈短言〉及 1921 年〈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一致，而不同於受到共產國際〈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影響的中共二大觀點，呈現以人類主動的能力推動社會革命，革命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發展生產力的革命規劃。

李達於 1920 年 12 月發表的〈社會革命底商榷〉一文，指出雖然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與社會革命之間有著密切關係，但「人為勢力」——階級鬥爭——能夠加速到社會主義的過程：

照社會主義的原則說，社會革命在資本制度發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自然要實現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種人為勢力——非妥協的階級鬥爭——促進他的速度。英美的資本制度比俄國的要發達得十數倍；英美兩國的工會，比俄國的也要發達得十數倍，何以社會革命不在英美兩國發生，反在俄國實現呢？這就是因為俄國社會革命黨實行的力量比英美兩國的大原故。所以我國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李達，1980）。

由上述引文可知，雖然理論上，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與社會革命發生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但在實際歷史過程中，卻是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低的俄國首先發生了社會革命。李達解釋，這是「俄國社會革命黨實行的力量」發揮的關鍵作用，該政黨領導的「階級鬥爭」加速了社會革命的進行。

在 1920 年 12 月完稿、1921 年 1 月發表的〈馬克思還原〉一文中，李達透過唯物史觀的說明，詳細地解釋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經濟必然性和人類行為的能動性的角色。他首先描述社會變遷的經濟原理，主要基於生產力和生產

關係的變化與衝突（李達，1980）。但經濟變化並非社會變遷的唯一因素，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由舊社會推移到新社會的途徑」並非僅有經濟的變化而已，還必須有「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識的行動」，否則，「社會黨無需幹社會革命，只聽資本主義自然發展好了。社會主義者也無需鼓吹革命，只努力去發展實業好了」（李達，1980）。李達認為，「階級覺悟」與「階級鬥爭」是社會革命爆發的關鍵要素：

資本制度發達到了一定程度，資本階級收集掠奪勞動者的血汗的剩餘生產，增加自己的私有財產，勞動者僅依工錢謀生。於是社會截然分為有產者無產者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受了資本階級的掠奪和壓迫，久而久之，就會發生一種階級的覺悟。有了這種階級的覺悟，就發生一種階級的心理。有了這種階級的心理，就會有一種階級的組織和階級的運動，就自然有一種團體的結合，成為階級鬥爭的行動。階級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得最後的勝利，自然要廢止私有財產，推倒資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觀一方面說明資本制度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注重現社會中新興的無產階級的力量。若忽視這種階級的心理和階級的自覺，不去助長階級鬥爭的運動，社會革命是不可期待的（李達，1980）。

換言之，李達（1980）既不同意被動地接受經濟發展「機械史觀的宿命論」，也不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會「必然」產生階級自覺與階級鬥爭，而是認為階級鬥爭需要人為力量的「助長」。若缺乏人為力量的「助長」和干預，即使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具備客觀上的階級分化，並不會自動爆發社會革命。

在〈馬克思還原〉（1921年1月）一文，李達進一步描述當前社會革命之世界趨勢，以及勞農俄國的革命成因，以加強說明人為力量主動促進社會革命的重要之處。他指出，「十九世紀後半期四五十年間，各國的資本主義雖日漸擴張，勞動人數雖日漸增加，而勞動者階級的心理與階級的自覺，十分幼稚，所以勞動組織和運動，都不甚發達」，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看到這個情勢，轉而採取「漸進主義」（李達，1980）。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李達指出

「最近二十年來」產生了情勢的變化：

階級的覺悟與階級的心理，愈益增大，而階級鬥爭的運動，亦日增劇烈了。……更舉實例說明，就是勞農俄國的締造。……列寧並不是創造家，只可稱為實行家，不過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相闡明表彰出來，善於應用，這便是列寧的偉大，世人都要拜服的（李達，1980）。

由上述引文可知，雖然李達並未說明最近二十年來階級自覺與鬥爭日益劇烈的原因，但透過勞農俄國和列寧的例子，李達顯然認為列寧正確地理解、實行馬克思的主張，是造就勞農俄國的主因。換言之，馬克思的理論雖然正確，但理論的正確並不必然保證社會革命的成功；階級運動的歷史和勞農俄國的例子顯示，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正確地「實踐」馬克思的主張，才是社會革命成功的關鍵。

如此，直至 1921 年初，李達對於唯物史觀的理解，雖然也重視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必然衝突而導致的危機，以及階級覺悟、鬥爭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增長的趨勢，但在這些危機和趨勢的基礎上，還需要人為主動地加強階級覺悟和推動階級鬥爭。換言之，即使資本主義發展鋪墊了階級鬥爭的條件，但「階級意識對社會變革有重要的能動作用」（羅海澄，2008）。李達強調「階級自覺」的重要性，亦是 Nick Knight（1996）認為李達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Knight（1996）指出，李達先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強調意識（consciousness）作為社會變遷中介（medium）的角色，意識到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變遷的助產士（midwife）。這一觀點反映在李達所理解的俄國經驗，即是俄國社會黨和其領導人列寧，努力「表彰」、「實行」馬克思的思想，造就了勞農俄國的誕生。

因而，即使中國的工業發展比俄國更落後，但根據中國社會受國際資本主義影響的情況和俄國革命的例證，中國已具備李達所描述的社會革命之前提條件、時機，所欠缺的僅有階級覺悟了。李達寫作於 1922 年 4 月、發表於 1922 年 7 月的〈評第四國際〉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正在準備著

最末次的大戰爭，爆發就在目前了」，因而「無產階級，應當用十分急進的作戰的精神，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猛烈的從事宣傳、運動、組織、訓練，務期軍勢充實，以便一鼓推倒資本階級」（李達，1980）。至於革命的進行，李達（1980）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應先由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組織一個共產黨作指導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無產階級的頭腦，共產黨人散布到全體中間宣傳革命，實行革命」。

然而，1922 年 7 月所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接受的共產國際指示，卻不同於李達的規劃。中共二大接受第三國際之〈關於民族與殖民地決議〉，認為中國革命應分成兩個階段，中共應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待該革命成功後，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共召開二大之前，1922 年 6 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即反映了此一主張：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鬥，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但是在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中央檔案館編，1991）。

李達參與了中共二大的召開，並在 1949 年的回憶中表述了他的感想——「我看了當時所發表的主張，與當時的情況相差太遠，我覺得馬列主義的理論仍須有深入的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我自認自己不夠積極；另一方面，我想還是專心去研究理論為好」，因而在中共二大之後，李達便離開中央黨務而作為一普通黨員了（李達，1980）。

關於李達對於中共二大的感想，一些學者認為這源自於李達與張國燾之間的爭執，以及李達對於自己個性的判斷（王炯華等，2004）。另外一些學者指出，李達此時希望直接推翻資本主義，並不同於列寧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論設計的兩階段革命；至於李達與中共二大的差異，這些學者將之歸因於李達並未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的當前任務（羅海澄，2004；宋鏡明，1997）。李達未在其回憶中進一步說明他對於中共二大決議的看法，但

根據李達此時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劃——已經進入產業革命而多數中國人已成爲無產階級的中國，可透過人爲力量主動激發無產階級覺悟而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一方面援助蘇聯，另一方面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補課」生產力，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使李達的規劃與中共二大並不相同，但他對於中國社會的性質和革命當前任務的探討，亦源自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且兼顧了社會革命之物質前提、階級自覺與階級鬥爭、政治力的作用與運用、以及生產力與社會階段的變遷等重要問題。

而陳獨秀在 1920 年 9 月 1 日的〈談政治〉一文中，與李達同樣強調人類行爲能動性的重要之處，認爲「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陳獨秀，1993）。如同李達，1920 年的陳獨秀重視人的精神、意志對於改造社會的作用，並在 1920 年 11 月發表的〈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透過俄國革命的例子，說明人的行動可以在「社會變遷的軌道」上加速社會變遷的進行，「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陳獨秀，1993）。

然而，當陳獨秀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時，D. K. Kwok（1971）認爲，透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陳獨秀對於科學的預設，便邏輯地把科學和社會科學視爲同一事物，並且將經濟視爲最重要的力量。陳獨秀 1921 年 1 月 15 日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之後經陳獨秀修改，於 1921 年 7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社會主義批評〉一文，指出近代的社會主義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社會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會經濟制度——即生產和分配方法——發生了自然的危機」，因而必須在認清「現社會底經濟的事實」的基礎上，設法改造「生產和分配方法」（陳獨秀，1993）。在 1922 年 7 月發表的〈馬克思學說〉一文中，陳獨秀對於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更進一步向生產力的作用傾斜。

在這一篇陳獨秀於 1922 年 4 月 23 日演說，之後於 1922 年 7 月發表於《新青年》的〈馬克思學說〉一文中，唯物史觀首先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認爲「一切制度、文物、時代精神的構造都是跟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的」，因而「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

識」；此外，「生產力」推動著社會的變遷，「生產力有變動，社會制度也要跟著變動，因為經濟的基礎（即生產力）有了變動，在這基礎上面的建築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來，所以手白造出了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製粉機造出了資本家的社會」（陳獨秀，1993）（引文中的括號為陳獨秀所加）。陳獨秀在該文中進一步指出，當「生產力發展到這社會制度（即法律、經濟等制度）不能夠容他更發展的程度，那時助長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反變為生產力之障礙物」，生產力遂與社會制度衝突，結果「舊社會制度崩壞，新的繼起，這就是社會革命」（陳獨秀，1993）（引文中的括號為陳獨秀所加）。

由此可知，在 1922 年 7 月時，陳獨秀基本上將「生產力」視為推動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生產力」既是社會制度等所有其他結構的基礎，也是人類意識的基礎。<sup>14</sup>而上述這一馬克思社會變遷的原理之所以被稱為「科學」，陳獨秀在同一篇文章（1922 年 7 月發表的〈馬克思學說〉）中指出，是因為「他能以唯物史觀的見解，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以成立所以發達所以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自然結果，是能夠在客觀上說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觀上主張當然的理想」（陳獨秀，1993）。他在文章中繼續論證，「階級鬥爭」同樣具有「科學」的必然性，因為「馬克思的革命說乃指經濟自然進化的結果」，「階級鬥爭說乃指人類歷史進化之自然現象」；既然無產階級的人數增長、抵抗的「覺悟」均源自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產階級之傾覆及無產階級之勝利，都是不能免的事」（陳獨秀，1993）。

因而，在唯物史觀的理論理解上，李達與陳獨秀呈現了不同的側重——李達強調人為力量推動階級鬥爭以加速革命進行的能動性特徵，陳獨秀更多地強調生產力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關鍵地位，以及唯物史觀之「科學必然性」。兩人對於唯物史觀的不同理解，可能影響兩人面對共產國際指令時的不同反應。當共產國際的民族殖民地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從中國政治經濟的現況來界定、限制中國革命現階段任務為民主主義革命時，李達對此一

<sup>14</sup> 根據 William H. Shaw (1978) 對於馬克思思想的解釋，「生產力」的增長是馬克思認為歷史發展主要的推動力。而比較陳獨秀與李達對於唯物史觀的看法，陳獨秀較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



指令抱持著疑惑，但陳獨秀基於對生產力的重視，則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二大的革命策略較為合拍。而在實際的政治態度上，李達重新思索、研究馬克思主義而暫不從事中央黨務的工作。至於陳獨秀，他反對共產國際命令的部分，也僅是與國民黨黨內合作的方式，而非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目標或統一戰線的策略（唐寶林，2011）。

## 陸、結論

身為中共創黨黨員之一的李達，其備受中共史學家肯定的革命貢獻之一，就是參與了社會主義論戰並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當時，馬克思派知識分子必須回答，落後的中國該以何種方式發展生產力、社會革命應該如何進行、中國進行社會革命所需要的條件和動力等問題，以論證為何工業落後的中國，能夠適用發展於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更能透過馬克思主義而進行中國的社會改造與工業化、現代化。

身為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與投身創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行動者，李達以中國已進入產業時代、中國人多數淪為無產階級的論據，說明中國具備社會革命的資格與條件。既有社會革命的物質前提，進行社會革命的方法，則必須依賴人為引導階級自覺的產生、與資產階級爭奪政權；革命成功之後還需透過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革命成果與發展工業，落後的中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在李達的設想中，一個開始工業化卻缺乏工業的國家，需要龐大的階級自覺與階級鬥爭的力量以進行社會革命；然而，俄國新經濟政策的經驗顯示，這些人類行為的能動性力量僅能幫助這個國家進入無產階級專政階段，而非立即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待轉換政治力的階級基礎、以政治力主導生產分配，將生產力提升至「大工業」之後，中國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如此，李達以人為引導之階級自覺進行社會革命，再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發展生產力的策略，使中國革命既取決於人類行為的能動性，也符合馬克思主義以生產力、生產關係規定不同社會階段之社會變遷原理。而李達透過解釋俄國新經濟政策，以「不同比例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要素」衡量各國在革命前的各自「特殊情況」，各國的特殊性即被放在同一個普遍、共同的經濟量尺

上。且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調節、發展生產力之後，馬克思主義所規劃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遷普遍原理，將可適用於每個不同的國家與地區。而其中的關鍵，即是政治強制力（由無產階級掌握）主導經濟發展的能力。

對於李達而言，中國已經具備社會革命的前提，且俄國實踐新經濟政策的情況，也要求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盡快進行社會革命，推翻國內資產階級。但社會革命的爆發與否，關鍵在於中國是否具有足夠的階級自覺。李達因而憂慮中國群眾缺乏足夠的自覺，未能產生推動社會主義的足夠動力。然而，這一中國可喚起群眾、立即推翻資產階級的主張，雖與中共一大的主張一致，但卻不同於共產國際將中國革命限制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劃，亦不同於接受共產國際主張的中共二大。

陳獨秀面對社會主義論戰時，一開始也與李達持同樣的看法，認為中國必須如同俄國一般，藉由階級自覺、階級鬥爭的爆發而加速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然而，在更進一步理解馬克思主義之後，陳獨秀對於唯物史觀的解釋逐漸加強了「科學」的特徵，尤其反映在生產力主導社會制度的變遷、甚至主導人類意識的變遷和階級鬥爭的發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科學之必然性」的強調，反映在實際的策略上，陳獨秀強調的「科學準則」保證革命必然發生與成功的作用，強化了共產黨權威，也限制了中國革命的程度。因而，當共產國際基於中國當時政治經濟情況而將中國革命限制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而非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時，陳獨秀重視生產力的理論理解，相較於李達，思想上應更能接受共產國際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與中國革命的策略。

如此，雖然李達與陳獨秀共同參與社會主義論戰、共同為馬克思主義辯護，也在 1920、1921 年提出了相似的馬克思主義理解，但卻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兩人的理論與策略即出現了差異與分歧。這些理論理解的差異不僅可能影響二人對於中共二大決議的不同態度，亦或與兩人在中共建黨之後的政治活動有關——李達雖然也強調組織的重要性，但他在 1922 年不再從事黨職，以研究和教育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反映了他對於人為引導、促進階級覺悟的重視；而陳獨秀堅持黨的組織和領導的權威，甚至之後因國共合作的問題與李達爭論，並導致李達 1923 年退黨。

airiti

整體而言，李達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轉化運用於中國的主張——在落後的、但已經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的中國，需透過人為激發階級自覺而進行社會革命，再運用國家力量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發展生產力，之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然而，在缺乏革命經驗的情況下，李達當時並未清楚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具體策略，也尚未考量在落後中國「以政治強制力主導生產力發展」可運用的具體方法或限制，以及可能付出的代價和風險。但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之前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與陳獨秀的異同，均呈現出在共產國際強力主導中國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潮、思想資源和革命理論，從中可能衍生的不同策略和革命路線的可能性，以及落後國家抵抗、回應資本主義的複雜情況。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中央檔案館編，199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199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李達，1980，**李達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達，1980a，「李達自傳（節錄）」，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1-12。
- 李達，1988，**李達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獨秀著，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1993，**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新青年**，政治大學圖書館藏上海書店影印本，1920-1922年。
- 共產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影印本，1920-1921年。
- 丁曉強和李立志，1999，**李達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王炯華，1988，**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 王炯華等，2004，**李達評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遠義，2001，「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3卷第4期，頁477-513。
-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2006，**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宋鏡明，1986，**李達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宋鏡明，1997，**李達**（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宋鏡明和熊崇善，1980，「李達」，**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1-75。
- 李其駒、王炯華和張耀先編，1991，**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

- 中人民共和國成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 1993, **蘇聯興亡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易國喜, 1997, 「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共性和特性研究——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之比較」, **山東社會科學** (濟南), 第5期, 頁58-60。
- 胡為雄, 2015, 「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有過『爭論』嗎?」,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第9期, 頁57-61。
- 唐寶林, 2011, **陳獨秀評傳**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楊貞德, 2000, 「到共產主義之路——陳獨秀愛國主義中的歷史與個人」,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16期, 頁263-338。
- 溫樂群、黃東姪, 2004, **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蔡國裕, 1988, **192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閻穎, 2001, 「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之比較」, **攀登** (西寧), 第4期, 頁58-60。
- 羅海滢, 2008, **李達唯物史觀思想研究**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蘇志宏, 2004, **李達思想研究** (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英文書目

- Dirlik, Arif. 1989.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1991.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night, Nick. 1996. *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Colorad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 Kwok, D. W. Y. 1971.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York: Biblio and Tannen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67.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82. *Ma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haw, William H. 1978.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Da's Thoughts of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un-Chun Shih

Postdoctoral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from a Chinese intellectual – Li Da. Li had believe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is essay points out how he explained Marxism and answered problems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Marxism. Furthermore, this essay compar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of Li Da with another Chinese intellectual – Chen Duxiu. These two intellectuals had their own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also ha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in Marxis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 and Chen show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licity of “Marxism” in China.

**Keywords:** Li Da, Marxism, Chen Duxiu, capitalism, state